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王牧华，罗 丽

摘要:在全面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主要包括课程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基于知识生产的逻辑，其构建遵循“问题意识与现象挖掘—概念创生与范畴勾勒—方法选择与路径探索”的基本理路。首先，明确课程问题与现象作为构建起点；其次，提出课程论学科体系的概念以实践问题为根本面向、以社会变革与政策引领为基本导向，课程论学术体系的概念创生注重独立性、前瞻性、规范性，课程论话语体系的概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化西方文化概念，据此勾勒基本范畴；最后，从变革知识生产模式、倡导学术对话互鉴和促进文化自觉自信三个层面探索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5)02-0021-08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目标追求。在此进程中，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如何才能复兴？关键在于人。习近平总书记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目标和动力，更是实现课程现代化的根本任务。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明确以课程培育现代中国人的根本目标，加强课程理念现代化、课程目标多维化、课程设置个性化、课程实施生本化、课程支撑手段数字化和课程评价多元化^[2]，构建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

术体系，促进课程的内涵式发展过程，以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一、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起点

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认识与经验”^[3]，包括碎片化知识和系统化知识。知识体系指向的就是系统化知识，表现为一种知识总和的概括性体系，包含概念范畴、逻辑推理和基本结论等环节，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3]。所谓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是在总结课程实践经验和明确课程问题基础上由课程论的概念、范畴、原理、方法按照逻辑关系构成的总体，主要包括中国课程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基于此，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从问题意识出发，进而创生课程论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重大课题项目“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机制研究”(K24YA2020002)；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明互鉴重大项目“中希馆校合作教育共同体建构研究”(2023WMHJ02)。

作者简介:王牧华，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罗丽，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重庆400715)。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特色概念并勾勒出相应的范畴，最后经由逻辑推理形成基本结

论，以期切实解决中国课程问题（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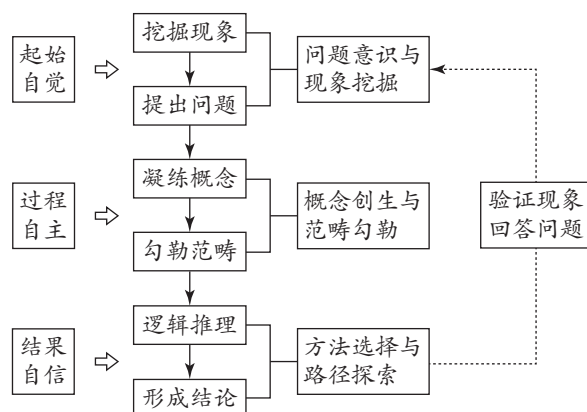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分析框架

作为一个“中国式”的论题，必须自觉树立起相应的问题意识，以课程论的中国问题为研究起点，保持坚定的学术立场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在观照天下的同时，从中国课程现象中挖掘出课程研究的真实问题。

（一）知识体系始于课程研究中的真实问题

科学与知识的增长始于问题，课程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都需要以问题为起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课程研究的问题繁复，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成为产生新知识的学术问题，一些问题无须以学术的方式研究，还有一些问题则难以仅凭学术的方式来解决；唯有那些长久存在且事关课程本质的真实问题才能成为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应该研究的问题。^[4]具体来说，知识体系始于时代之问，反映教育全球化持续推进、新一轮课程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等社会变革，具有时代性；其同时映射中国之问，既要求辩证处理中国课程研究的学术与政治、特殊与一般之间的矛盾问题，又要求反映国家关心、社会关注和人民关切的课程热点难点问题，如我国“双减”背景下的课程问题，具有明显的中国性；其还能回应世界之问，在文化比较中提升对课程问题的异质性认识，在面向全球的治理问题探究中展现中国问题意识。

（二）真实问题来源于课程现象挖掘

有关课程研究的真实问题大多隐身于丰富而复杂的课程现象中，极大地考验着研究者的理论积淀、学术敏感性以及应对挑战的学术勇气。其一，深度挖掘中国课程研究者的实践思想与经

验。近代以来，我国已有一批课程论学者开展了富有实践意味的课程研究，如“生活教育”“做学合一”“实业教育”等。同时，从实践中创生新的课程模式的案例也不计其数，值得广泛挖掘。如上海市某学校基于“课程整合”相关理论思想，开发了一套适用于不同学习阶段的课程体系，将分学科课程与跨学科课程进行了有效整合，形成“主题课程+广域课程+模块课程”的多学科整合框架。其二，深刻描绘中国课程改革实践的成效与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教育学者开展了诸多教育改革实践，如“新基础教育实验”“主体教育实验”“新教育实验”等，为构建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打下坚实的原创基础。当然，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国内教育形势，我国的课程改革实践也呈现不足之处，这就需要课程研究者加强与一线工作者的协同互助，探寻能有效指导教育改革的理论。

二、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

新概念的产生和新范畴的形成是检验一个理论是否创新的标识。概念、范畴和体系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三个层面逐渐抽象化理论化的过程，作为现代知识生产的关键环节，概念创生与范畴勾勒应运而生，成为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立在相应的概念与范畴基础之上。

（一）凝练课程研究中的中国特色概念

生产并提供能解释中国问题、中国现象、中

国实践的概念是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当务之急。^[5]理论的发展基于对概念的厘清、重构甚至创设。概念本身是一种思维工具，是论理词。在教育研究中，概念既可被用于指称研究对象，从而形成观念、形成命题、进行论证，又可被用于逻辑分析，从而形成解释教育现象的理论。

第一，课程论学科体系的概念以实践问题为根本面向，以社会变革与政策引领为基本导向。在公认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中，分析教育领域独有的实际问题，被认为是课程论成为一门学科的主要分类依据。^[6]当这些具体的实践问题对整个社会变革产生影响并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时，又能够进一步反向规定课程论学科任务、推动更新课程论学科研究方法、促进优化课程论学科建制、提升课程论学科质量。首先，提取课程论学科体系的概念须深研中国课程实践问题与现象。课程研究中的概念蕴含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双向互动过程，是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有效提炼。课程实践问题与现象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空间性的，因而相关概念自然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从实践视域对课程概念进行构建与阐释，既有助于规避课程论学科在转化西方概念过程中的“水土不服”问题，又能够突出人在课程论学科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一种“主客交融”或“互为主观”的方式来显豁课程研究中人文与社会的“意义之网”结构。^[7]其次，社会变革迅速、课程政策频出，引领课程论学科体系的概念生成。课程论学科体系是课程论学科知识的制度化、结构化存在方式，“不同时代为知识生产创造了时代语境，为知识本体提供价值引领”^[8]，课程论学科体系不仅要敏锐洞察社会的变迁，识别教育领域的新趋势和新挑战，还要在一定程度上灵活回应社会和政策的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元素与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譬如，“核心素养”是课程论研究领域近年来的热点概念。它是在新的知识观引领下作用于学生发展本质需要的中国特色概念，极大地充实了课程的育人价值^[9]，也是我国课程实践领域对于新时代新型人才形象的具体描绘，是促进学校内涵式发展的根本动力。^[10]通过整合并创新社会与政策领域的概念，有助于实现课程论学科概念多维度的创生。

第二，课程论学术体系的概念创生注重独立

性、前瞻性、规范性。独立性确保了课程论学术体系能够根据自身的逻辑和发展需要，自主地进行知识生产和创新。前瞻性是课程论学术体系履行其理论引领职责的关键所在。课程论学术研究的问题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动态变化的。然而，已有的概念提取却在新旧范式转换中难以充分解释随时代变革而产生的新问题。立足当下，回望课程论学术研究历史，面向课程论学术研究未来，深入剖析其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未来发展机遇，能够为创生未来的课程概念寻找到新的生长点。规范性是课程论知识效度的重要保障。事实与价值杂糅是课程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无法避免的知识特质，这就导致课程研究领域的相关概念必须依附多变而复杂的知识情境，其中充斥着意识、情感和文化等要素。但是，科学概念的形成要时刻检验其规范性，以确保知识的效度。一直以来，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异就是西方概念体系更讲求科学规范性，而中国文化概念体系更讲求联想意象性，这使诸多中国课程研究中的概念都相对模糊。要在追求特色的基础上强调规范性：一是概念研究外在形式上的规范，包括研究的条件与方法等；二是概念研究的结果本身作为一种知识的整体规范，符合相应的哲学基础与价值预设。^[5]

第三，课程论话语体系的概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及转化西方文化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众多可供借鉴的文化资源，可以从中寻找基本概念，加以创造性阐释，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课程论概念，当前对其挖掘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学界应充分利用好现有的一大批中国传统教育典范文献资源，从课程论的核心概念入手，包括“课程”“学”“教”等，再梳理出核心概念的分支概念体系，从而延展转化出一系列有助于解释当下中国课程实践现象的概念。与此同时，作为学科意义的课程论源自近代西方，创生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概念离不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有学者提出“课程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意在置身于多元文化的全球化环境中进行自我文化转型^[11]，并提出课程文化自觉的三个策略：传统课程文化寻根、国际课程文化理解以及本土课程文化生成。^[12]课程在认识“我是谁”的基础上与“他

者”对话，对于丰富课程学科结构有重要意义。但受制于长久以来的“学术追随者”身份，以转化外来的元概念为主而忽视中西方语境差异最终导致课程概念出现“排斥反应”等问题，须提升西方课程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适切性。此外，继承并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课程论话语体系有别于西方的关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下的课程话语，以人民为中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依归，提炼“人民性”的课程概念；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最有力的话语内容来源便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学思想，强调深入理解和提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学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形成的课程观点、概念。

(二) 勾勒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多维范畴

范畴反映一个理论体系最一般、最普遍的性质和关系^[13]，既体现人们对某一领域事物的认识，又映射该领域科学概念的相互联系。它具有

一项重要的认知功能，那就是能够构建丰富的归纳推理，这也成功解释了范畴为什么能够成为各种内容领域扩展知识和构建理论的有力工具。^[1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体系的骨骼和脉络，范畴显示一个理论体系完整的概貌。同样地，构建新时代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对范畴的勾勒。

范畴是对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所作出的中观层面的描摹。“课程论是以课程设计为逻辑起点研究教育的一门学科”^[15]，课程论学科体系从学科知识、学科对象及其所处的学科社会环境三个方面进行规定。课程论学术体系由学术品性、学术共同体、学术成果之间的互动实现更新发展。课程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在实践范畴、政策范畴和历史—文化范畴之间互动、结合、变换和推演，从而推动课程范畴的流动性和整体性发展。基于此，可以描绘出中国课程论学术体系多维范畴图景（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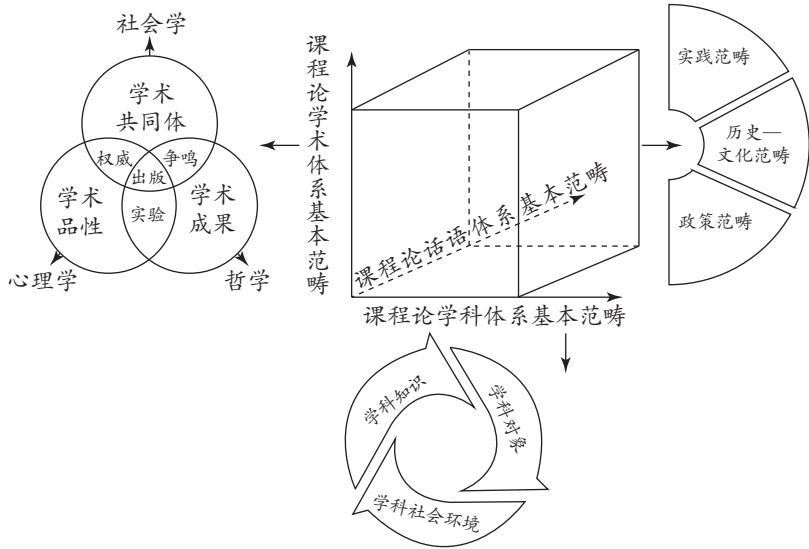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多维范畴

一是勾勒课程论学科体系的基本范畴。课程论作为一门专门研究课程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价的学科，其学科体系主要包括学科知识、学科对象和学科社会环境等基本范畴，指向课程活动这一跨越学习世界、教学世界、技术世界和生活世界等生态场域所需的主体、介质和环境等要素。其中，作为主体的课程论学科对象是指课程论学科研究和实践的对象，一般包括学生、教

师、课程内容、课程方法、学习环境等，学科专家主要分析这些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分析如何通过课程设计来促进中国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作为介质的课程论学科知识包括课程理论、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方面的知识，有助于提升中国教育者对课程本质、目的和功能理解，进一步帮助其有效地组织和实施课程。作为环境的课程论学科社会环境包含课程论学科

研究和实践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社会环境所具有的独特社会价值观、教育政策、经济状况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对课程的设计和 implement 产生影响，使中国课程论学科体系得以区别于西方课程论学科体系，并提供源源不断的学科体系自主生长资源。此外，中国课程论的学科体系还涉及学科方法论、学科历史、学科发展趋势等范畴，共同为中国课程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二是勾勒课程论学术体系的基本范畴。课程论学科体系的发展推动着课程论学术体系的形成。从施良方所描述的科学论述三维度来看^[16]，课程论学术体系的基本范畴主要指向心理学维度上学者个人的学术品性、社会学维度上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知识维度上生产的学术成果等。中国课程论学术体系的发展要围绕中国课程论学术成果系统这一核心，立足中国的课程实践并联结中国课程学者，加强各级各类平台的交流，推动中国课程论学术命题、观点、思想和理论的互鉴式创新。

三是勾勒课程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课程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为话语体系提供持续的概念供给，使课程论在言说的过程中不断增大学科影响力和提升学术参与度。课程论话语体系通过实践、政策和历史—文化三大基本范畴向外表达中国课程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所蕴含的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课程论话语体系的实践范畴由课程本身所具有的教育实践属性所决定，中西方课程实践在具体的教育理念和目标落实、课程设置、课堂管理、师生关系、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我国课程学者开展的富有实践意味的课程研究和课程改革实践经验为课程论的话语表达提供了有效的借鉴。课程论话语体系的政策范畴来源于新时空背景下的行政调控。政策话语因其所具有的政治性、时效性、价值导向性和实际应用性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课程学者必须将“论断”的政策话语转化为“论证”的学术话语才有利于其被学界所接受^[17]，否则一味地诠释课程政策只会使课程研究随着政策的更替而失去自主进行理论批判和知识建构的能力。课程论话语体系的历史—文化范畴来源于我国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中国文化历史中的教育思维方式、中国古代优秀课程思

想、中西文化互鉴中的课程反思共同塑造了课程论的历史—文化话语。围绕实践、政策和历史—文化范畴构建课程论话语体系，我们才能真正扭转“中话西说”的局面，实现“中话中说”的目标，进一步讲好中国课程故事并传递好课程研究的中国声音。

三、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作为对前述概念与范畴的进一步抽象化与宏观性表达，推进中国课程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快构建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与重要路径。

（一）变革知识生产模式，加强课程论学科体系建设

知识生产模式是决定学科质量的关键因素。^[18]伴随着课程活动边界的扩大，课程论学科的知识生产不仅要满足单一学科的评判标准，还要应对政府、企业甚至公民社会的需求，实现从单学科到跨学科再到超学科的跨越。与系统学、协同学等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特点的学科相比，虽然课程论并非典型的横断科学，但其在教育实践中具有超学科特性。课程论学科体系的完善应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着手，不断开拓课程论学科体系的知识生产来源、更新课程论学科体系的知识生产过程样态、提升课程论学科体系知识生产的应用水平。

第一，开拓知识生产来源，构建课程论学科群落。课程理论研究范式的不断转型、信息技术浪潮的迅猛推进、国家战略需求的持续更新以及学生自身学习发展需求的变化共同驱动着课程论学科体系的知识生产。建设课程论学科体系，需要拓宽学科视野，补充知识生产来源，加强与新兴学科的融合，尤其注重加强其与学习论、信息技术科学、未来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知识的联系，立足课程为了儿童更好地学习这一基础目标，前瞻学生未来社会生存竞争所需的素养，解决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学生发展的问题，并遵循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政治逻辑、人类普遍利益需要的公共逻辑、学生自身成长发展的竞争逻辑，构建起课程论学科群落。

第二，更新知识生产过程样态，打造课程论

学科知识创新系统。打破在单一知识领域当中“自娱自乐”的学科组织形态,将政府、企业产业界和公民社会引入生产过程,搭建综合性的课程论学科组织,设计开放性的课程论学科制度,创新包容性的课程论学科文化,生成集成性的课程论知识,形成一个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知识创新系统,融合相互促进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以竞合、共同专属化和共同演进的逻辑机理驱动课程论学科知识生产资源的生成、分配和应用过程,实现课程论学科知识创新和资源动态优化组合。^[19]

第三,重视对知识生产应用的评估,保障课程论学科发展的质量。课程论学科的发展在教育实践中解决问题的水平如何、满足非学术人员需求的程度如何,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综合的、多维度的质量控制体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知识管理,以适应不同范围的学科兴趣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或政治兴趣的应用情境。

(二) 倡导学术对话互鉴,完善课程论学术体系建设

从学术境域角度来看,关于课程理论的探讨,始终难以逾越对西方课程理论与中国课程理论这对关系的讨论。这对基于空间维度形成的概念实质指向的是对理论范畴格调的身份认同。中国课程论是在引入西方课程学术体系后才得以建立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课程论学术研究中长期扮演“追随者”的角色,“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学与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在模仿、学习、跟踪处于核心学术地带的知识分类、语言风格甚至表达习惯”^[20]。面对抵御西方学术霸权与构建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双重需要,中国课程论需要在与西方课程论学术体系的对话互鉴中完善自身的学术体系建设。

第一,凸显本土学者的实践品性,形成具有独创精神的学术共同体。每一种知识体系都具有实践合理性、自我修正性和生命阈限性等特征。^[21]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一定要不断激发实践活力,增强其落地合理性,并在演化发展中自我修正,在全球课程论知识体系中自主创新。这要求中国课程论学者深挖本土课程实践之需,突破从理论到理论的生产模式,推动课程论理论成果向课堂实践的转化;改进学术组织方式,从

个体钻研课程理论走向课程论有组织科研;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主动探寻国际课程论的知识动向和知识需求,为全球课程治理作出中国贡献,从西方课程论的知识消费者转型为国际课程论知识的引领者。

第二,坚守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取向,提升本土理论在国际理论研究中的竞争力。构建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少不了“民族性”的彰显,这离不开对民族精神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22]中华民族在长足的发展中积淀了丰富的课程思想和学理精神,通过将其转化为更加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重要学术资源,并积极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能够创新发展出更适应时代要求和民族特色的学术体系,从而在国际课程理论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三,创新多元融通的学术研究方法,减少对西方方法论的依赖。“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23]掌握科学的方法并能够合理运用,是中国课程论学术体系建设的关键。受西方课程论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我国不少学者将实证等同于“科学”,将工具理性奉为圭臬,直接移植嫁接西方方法论,造成课程研究“两张皮”现象。中国的课程研究应形成多元融通的学术研究方法,辩证处理好科学与经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在实事求是的境遇分析基础上有效地采用事实论证与规范论证等多元研究范式,统筹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以适配具体的研究问题,既能够灵活应用智能技术,提高课程研究数据获取和分析的效率及精确性,又能为实证化的课程研究提供更多证据,促进思辨研究与大数据的实验研究相结合。

(三) 增强文化自觉自信,推动课程论话语体系建设

我们建立新的话语体系应立足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资源,既要回归“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体系的教育文化思维与认知方式,也要在“寻根”的基础上走入全球课程论知识场域,传递中国课程声音。

第一,立足“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体系的文化自觉。构建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体系,需透过文化表征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理性,以中国的思维方式解读与提炼中国的课程经验,生成中国课程论的话语表达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质的课程思想,如儒家经典中规定了德育课程的基本内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论语》中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等课程学习方法,都能够为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话语提供重要文化思想资源。此外,以话语体系构建反映中国的思维方式,更是重中之重。长期以来,西方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还原论的研究范式对教育研究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中国课程论研究也常常陷入对教师与学生进行主客二分的研究怪圈。实际上,课程现象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教育学者不能将自然科学那一套分析思维直接照搬到课程研究中。回归到最能表达中国教育理性的传统哲学中,可以发现诸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深刻表达了中国整体性、综合性的智慧形式。也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整合”思维,这也是区别于西方理性思维的显著特征。只有基于中国哲学的认知思维方式言说课程研究,我们才能有效解决“应试教育”的痼疾,做到“破五唯”和“减负提质”。

第二,打造“对接时代—对话国际”境脉的文化自信。中国课程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寻根”基础上将此“根”植入东西方认知共存的话语生态系统中,以多元对话孕育课程论新的生机。一是确立中国课程论话语体系的文化主体性,这是其得以参与国际对话的基础。课程不仅具有传递和更新文化的工具价值,其本身也已随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成为一种具有主体地位的文化,可以筛选、内化并创生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文化^[24],重新对课程论的概念、范畴进行文化阐释,并加强文化实践,提出中国方案。二是保持课程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情境性与开放性,加强中西文化互鉴。既要加强中国文化理性言说方式,将课程研究的对象放回到其应属的文化情境之中,对其展开整体、开放和阐释性的

解读;又要了解当下的国际课程理论热点,搭建合适的沟通桥梁,用基于同一编码体系的“文化通用符”向世界讲述中国课程故事。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64.
- [2] 杨小微. 课程现代化: 向着未来的再出发 [J]. 新课程评论, 2019 (9): 7-15.
- [3] 张雷声, 韩喜平, 肖贵清, 等.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 (7): 5-6.
- [4] 陈洪捷, 侯怀银, 余清臣, 等.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笔会) [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3): 15-39.
- [5] 张大伟, 周彤. 概念供给: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当务之急 [J]. 编辑学刊, 2023 (1): 6-11.
- [6] 郭元祥. 教育逻辑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19.
- [7] 李金铨. 传播纵横: 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9.
- [8] 侯怀银. 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其关系 [J]. 教育研究, 2024 (4): 59.
- [9] 杨小微, 胡雅静. 从“以教定学”到“为学而教”: 中国教学走向现代化的 40 年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8 (8): 9-24.
- [10] 钟启泉.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发展: 挑战与课题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6 (1): 3-25.
- [11] 田正平, 刘徽. 课程理论研究六十年: 基于概念史的研究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9 (11): 14.
- [12] 刘启迪. 课程理论与实践创新: 第六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综述 [J]. 课程·教材·教法, 2008 (12): 6-15.
- [13] 亚里士多德. 范畴篇 解释篇 [M]. 方书春,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9-42.
- [14] 郁锋. 概念多元论与基于范畴的归纳推理 [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23 (4): 9-14.
- [15] 王鉴. 如何认识课程论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J]. 上海教育科研, 1995 (2): 11.
- [16] 施良方. 课程理论: 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244-245.
- [17] 尹占文. 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建设的理性反思及其未来进路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 12-21.
- [18] 白强.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学科建设创新

- [J]. 大学教育科学, 2020 (3): 31-38.
- [19] 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J, CARAYANNIS E G, et al. Mode 3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quadruple helix innovation systems; Twenty-first-century democrac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development [M]. New York: Springer, 2012: 1-63.
- [20] 朱华伟. 知识社会学视角下高等教育学的知识属性、价值取向及发展路径分析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 (9): 18.
- [21] 王立胜. 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文选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36-37.
- [22] 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EB/OL]. (2019-06-15) [2024-10-19].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6/15/content_5400577.htm?eqid=fc8c8ae0000bb04b000000006649536bc.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8.
- [24] 靳玉乐, 罗生全. 课程理论的文化自觉 [J]. 教育研究, 2008 (6): 41-46.

(责任编辑: 刘启迪)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urriculum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ang Muhua, Luo L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urriculum the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system in China mainly includes curriculum theory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the logic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construction follows the basic logic of “problem awareness and phenomenon mining, concept creation and category outline, and method selection and path exploration”. First, we should identify curriculum problem and phenomena as start. Second, it is imperative to put forward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is based on practical problem and regards social change and policy guidance as orientation. The concept crea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focuses on independence, foresight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concept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is rooted i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novates Marxist thought, and transforms the concept of Western culture, so as to outline basic category.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path from three aspects: reform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advocating academic dialogue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promot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onfidence.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ese curriculum theory;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